

李保林
杨翰卿
孙玉杰
主编

中国宋学 与 东方文明

河南大学出版社



98
K244.03
7
2

BA31\19

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

主 编

李保林 杨翰卿 孙玉杰



河南大学出版社



3 0003 1024 7

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

主编 李保林 杨翰卿 孙玉杰

责任编辑 晨 晟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市中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75 字数:370千字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 定价:16.50元

ISBN7-81041-360-0/K·186

目 录

绪 论	(1)
-----	-----

上 篇

第 一 章 宋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15)
第 二 章 宋学的主要流派及其嬗变	(55)
第 三 章 宋学探讨的主要问题	(93)
第 四 章 宋学的治世论	(124)
第 五 章 宋学的富国论	(154)
第 六 章 宋学的教化论	(180)
第 七 章 宋学在近现代的影响和命运	(220)

下 篇

第 八 章 宋学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上)	(251)
第 九 章 宋学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下)	(296)
第 十 章 宋学与朝鲜文明	(336)
第十一章 宋学与日本文明	(377)
第十二章 宋学与东南亚诸国文明	(394)
第十三章 宋学与印度文明	(410)

第十四章 宋学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435)
结 语·····	(454)
主要参考论著·····	(463)
后 记·····	(467)

绪 论

中国宋学是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的重要阶段。它的孕育和成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之后，即发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作用。其社会效果不仅在我国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而且远涉重洋，传到朝鲜和日本，在东南亚各国，也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因而，研究宋学，揭示其丰富的内涵及其发展规律，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必要工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的哲理思维的发展方面，宋学研究将会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宋学内涵的界定及其研究对象

宋学这个概念很早就出现了，它是相对于汉学而被学术界研究的。历代学者对宋学的内涵界定是很不相同的，大体说来，有广义的和狭义两种见解。从广义上说，宋学是中国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它囊括了宋代整个社会的文明成果。从狭义上说，宋学是中国宋代以哲学理论为核心的文化理论体系。简言之，宋学就是宋代学术思想。本书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对宋学展开研究和论述的。

由此看来，宋学有别于宋代哲学。宋代哲学是宋学的核心部分而不是宋学的全部，宋学除了核心部分外，还有丰富的外围部分，才构成了完整的宋学，也可以说宋代哲学是宋学的升华，是宋学的进一步凝结和抽象。这种升华、凝结和抽象，是建立在雄

厚的基础理论之上的，宋学就是宋代哲学的基础理论。因而宋学包括了升华和基础理论两个部分，这才构成了完整的宋学。

由此看来，宋学也有别于宋代学术。宋代学术是个庞大的、具体的、多样的学术体系。宋学不研究整个体系的学术表现和它所包含的具体形态，而是研究整个体系和具体形态的学术思想。研究这些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阐明它的规律性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此看来，宋学还有别于宋代儒学。宋代儒学是先秦儒学重整旗鼓，并取得新的辉煌的儒学。先秦儒学本来是百家中的一家，到了汉代，经过汉代的改造，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它的内容已经和孔孟学说有了很大的不同了。特别是经过魏晋玄学和隋唐以来的佛学的强大冲击，其内容和社会需要的距离也是越拉越大。到了宋代，经过宋统治者和思想家几代人的努力，儒学典籍被钦定为教科书，但它毕竟还是儒学。宋学不是单单的儒学，宋学要研究儒、道、法、佛和伊斯兰等诸家学说在宋代的学术形态，研究它们的发展过程和它们在宋代达到的水平，特别是要揭示出儒、佛、道相融合以后的名义上的儒学所包容的佛、道内容，从中发现思想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社会地位和作用。

综合上述，本书阐明的宋学是中国宋代以哲学理论为核心的文化理论体系，简言之，就是宋代学术思想。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从纵的方面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到宋代的形态和水平；从横的方面说是宋代社会的各种学术思想。虽然是囊括一切，但主次分明。比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文艺思想、民族宗教思想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宋学在东方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特点

人类文明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知识，增长见闻，逐步摆脱愚昧和野蛮之后出现的进步现象。它的丰富、发展和提高

是依赖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发展和提高来实现的,它的载体是绘画、语言文字、器皿服饰、建筑物等等。人们总是通过对载体的观察和评判来了解文明历史的轨迹的。在构成人类文明的众多要素中,哲学思想是它的核心要素,因为哲学思想是思维活动的最高层次,它渗透在其他要素中,制约着其他要素。在人类文明的众多载体中,书籍是最重要的载体,因为它记载的内容清晰而准确,所以,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判断人类文明的阶段性,往往离不开书籍。但由于同类的书很多,很难以那一本为准,因而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概括方法即是称“学”。如儒学、老庄学等等。在各种各样的“学”中,进一步概括,能够从大的方面代表中华古代文明不同阶段的应该是:易学、汉学、宋学。

易学的兴起是中华文明的启蒙。据传说,伏羲作《八卦》,文王演《周易》,说明研究易学在商周以前已经开始了。这是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提高了人们的智慧水平的标志。近年来相继出土的那个时期的青铜器,质地坚韧,花纹细致,造型美丽,即可证明当时的智慧水平。社会有需要,人们有能力研究最高层次的思维活动规律,这是易学兴起的基本条件。

易学的源头和代表作是《易经》,以后又有对《易经》的注释和阐发性的《易传》,两本书合成《周易》。这是我国有文字以后最早成为书籍的知识总汇和哲理升华。这部书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可见它的学术价值之高。其实,从《易经》的内容来看,很难说是哪一家的著作。如果说以后陆续出现的各个学术派别,其中包括儒家都从《易经》中得到智慧的启示,并从中吸取有益的成果,藉以建立和丰富他们的学说的话,倒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至于《易传》,情况可能复杂些。就我们今天看到的《易经》这本书来说,很难说清它的作者是谁,或者它的起草人是谁,参加修改、增补的有哪些人,以及它的定稿人是谁。《易传》有人说是孔子作的,因为孔子是当时的大学问家,他研究过《易经》并

给他的门生讲解过，以后逐渐成文，又以后，集文成册就是《易传》，这个轮廓是可信的。但那也只能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易传》的雏形。中间和以后又有多少人参加修改、补充而成书，这是至今尚没有确切的文物说明的问题，有待于今后考古工作者来解答。由于孔子研究和讲解《易经》可看做是《易传》的起源，而且又有很大可能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以后孔门弟子的弟子参加了《易传》的补充和修改，所以在《易传》中较之《易经》具有明显的和较多的儒家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易经》的内容来看，涉及战争、生产、婚姻、祭祀等，应该说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面总结和启示。从它的外在特征和直接满足社会需要来说，它是求神问卜的工具书，也可以说是占卜术汇编。当时人们认为通晓这本书，可以预知各种领域的吉凶祸福，预知各种行动的得咎与无咎。这比原始的龟裂占卜高明多了。

把《易经》内含的哲理知识揭示出来并加以系统论述成为理论形态，以满足社会上的哲学理论追求，是《易传》作者的贡献。《易传》不仅概述了《易经》中内含的哲学思想，揭示了若干基本观点，以及这些基本观点怎样用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而且还分门别类地阐发了八卦和六十四卦所代表的具体现实事物及其变化原理，说明了六十四卦排列顺序以及各卦中体现的阴阳对立、刚柔相济的规律性意义。所有这些成就和《易经》比起来，不仅剔除了一些迷信愚昧的成分，而且抓住了《易经》中辩证思维的科学价值，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这当然是哲理思维的巨大前进，是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总括《易经》和《易传》合称易学。这门学问的价值就在于其内涵中的发展变化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和提出，体现着人们欲知吉凶祸福，不再求神，不再问卜，而要探求事物本身的规律而趋利避害。这是对当时人类文化水准的总结，对后人的启发也最大。《系辞》中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

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还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作者把上述等等类似观点，总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并且进一步说明了这些哲理结论的来源是“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就告诉我们易学中的各种原理是观察、研究、总结而来，而不是迷信、神学的臆说；易学中的各种原理是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抽象而来，而不是某一个现象、个别领域的概述。因而它是普遍性、一般性的认识，也就是哲理思维。这是摆脱愚昧超越神学的进步标志，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阶段的开始。正是因为如此重要，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易学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各种成就的高层次的总结。从这个意义说，对易学做过贡献的人数相当多，参予易学整理、修改的人数也不会少。其中有些人如孔子所起的作用更突出。由于易学标志着从愚昧迷信到文明的起步，当时的文明程度和水准还受着时代的局限，哲理思维只能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我们认为易学的兴起，是中华文明的启蒙。

汉学的出现是中华文明百家争鸣之集大成。汉夺得秦的天下，建立汉朝之后，吸取了秦朝速亡的教训，主要是秦奉行法家的治国之策，严刑峻法，重刑罚而轻教化，加上繁重的徭役和赋税，很快脱离了各阶层群众，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抗。特别是焚书坑儒，毁灭历史文明，和他们的本来愿望相反，加速了秦朝的覆亡。因而汉代建立政权初年，在指导思想上改变了秦朝独尊法术的观念，而代之以“黄老之学”，满足了群众休养生息的心理要求。在政治上推行王道和霸道相杂的措施，改变了秦朝严刑峻法的凶像，对上下相安、稳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上述措施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增强了汉代社会前进的物质基础。因此，也就相继出现了汉代绘画、雕塑、文学、冶铁、建筑等方面的繁荣局

面。事实说明，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在汉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它的突出标志就在于纠正了秦朝独尊法术之弊，形式上举起了黄老之旗，内容上吸取了百家之长。这种思想发展到汉武帝的年代，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了“独尊儒术”之后，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因为董仲舒尊的儒，也不仅仅是孔孟之儒，而是吸取了墨、法、道一些思想之儒，应该说，这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董仲舒之儒掺进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的“私货”，因而大大降低了汉学的水平。由此可见，汉学集前人之大成是对文明的贡献；构建了神学体系，给后人套上了枷锁，是对文明的束缚。魏晋玄学的盛行，就是对这个枷锁的反抗。汉唐之际，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之后的长驱直入，也证明了这个枷锁之无力。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发展期待着一一种体现新水平的理论出现，中华文明正在孕育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中国宋学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宋学是中华古代文明发展的高峰。宋学超过前人的方面很多，举要如下：

第一，宋学创立了天理说，把天和理结合起来，这就大大地改变了历史上关于天的观念。天不再是随心所欲的神秘主义的人格神，而是有理的。尊理就是尊天，知理就是知天。这样解释虽然没有完全达到天是自然界的科学水平，但它挣脱了天是神秘力量的蒙昧观念，就是对历史的大超越。

第二，宋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理、气、心、实四大流派，都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它和神学的目的论、谶纬神学论，以及其他有神论的界限是清楚的，而且明确、坚定。

第三，宋学的哲理精华是理一分殊论。把理一和分殊结合起来，这是思维水平的高度概括。这个理论解开了当时学术界的难题，为后人也提供了更多的启迪。

第四，宋学的“吉凶由人”的命题，是历史观的结晶。它不

仅超过了“畏天命”的宿命论，而且超过了“天人交相胜”的浮浅之见。

宋学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当然是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提供的材料凝聚而成。同时，宋学的形成也推动了宋代社会的前进步伐。宋代手工业、农业、商业的全面发展，绘画、文学、石刻艺术、建筑艺术等的繁荣，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宋学水平之高，都是相辅相成的。

站在宋学的学术高峰上，看过去的学术史，“一览众山小”；看后来，它开拓了元明清三代学术发展之先河。只是历史发展到西学东渐时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学术思想才出现了“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新局面，达到了中国学术思想的更高水平。因而，站在今天的科学水平线上，回过头去看宋学，也不过是“一览众山小”之别。这就是中国宋学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文化史上是非常显赫的，因而解剖宋学是研究中华文明的由来和发展的必要工程。千百年来，研究宋学的著述很多，成果累累。但是，世界发展变化到了今天，需要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宋学，并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前进，把宋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宋学不仅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走出国门，传到东方各国，和各国的学术思想相结合，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其影响不亚于国内。随着国际间的信使往返，互派留学生，以及僧侣交往，大量的宋学典籍传到国外，宋学研究者走上讲坛，不少译作、专著相继问世，研究机构也相继建立，等等一切，说明宋学在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对东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研究宋学的途径和方法

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它由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是互相关联的，又是相互独立的。因而，研究宋代文化系统既要与宋代经济、政治相联系，又要独立地进行研究。

一个社会的文化状况，它的外在形态即是衣食住行的方式和水准，也常常表现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交往方式、礼仪方式等等。其内在层次是人们的知识状况和思维方式，也就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联系以及人际关系交往的规律性知识的了解程度和驾驭程度，最终的核心层次是人们的哲理思维水平。它受所有外在层次的制约，又制约着外在层次，这里的制约方式和制约程度正是宋学研究的重点。从社会哲理思维水平考察社会人际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反过来，从人际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追溯其社会哲理思维状况。这是宋学研究同归而殊途的历程。从纷繁中寻脉络，从杂多中取其一，是宋学研究的任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重要的是起步走。毛泽东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87页）毛泽东这段话对我们怎样研究宋学启发很大。首先，我们要有当小学生的态度，不可自以为是。其次，要有历史主义观点和方法，要尊重历史，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历史是联系的，要从联系的实际出发。简言之，就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这是研究宋学的基本方法。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为《洛学与传统文化》讨论会写的代祝词中说：“注重直观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宋明道学尤其如此。老子注重‘为学’和‘为道’的不同。‘为学’的目的是增加知识，‘为道’的目的是提高人的智慧，用我的

话说，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如果用‘为学’的办法研究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道学，那就失之远矣！”冯先生的见解异常深刻，对我们研究宋学有很大启发。我们今天必须用正确方法研究宋学，揭示宋学即规律学的实质，才能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有很大益处。

河南开封是北宋建都的地方。赵宋王朝开国、治国的政治家、思想家的主要活动都在河南开封、洛阳等地，因而河南现有宋代文化遗迹比较多，挖掘和整理历史资料有得天独厚的地方。这是河南研究宋学的优长之处。范仲淹墓、邵雍墓、程氏两先生墓均在洛阳伊川，宋皇陵在河南巩义市；有名的嵩阳书院和名刹少林寺同在嵩山脚下，如今是旅游胜地，每年国内外的朋友参观考察络绎不绝。可以这样说，黄河两岸，沃野千里，寻觅宋代遗迹是极其容易的事。工作在河南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研究宋学，应该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充分地了解宋代文物，用文物说明宋学，这是极其重要的方法。

四、研究宋学与东方文明的现实意义

东方各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交往中也逐步形成和显示了东方文明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寻找东方文明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中国宋学是东方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因而研究当代的东方文明，不可不追根溯源。这就是今天研究宋学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向，已经提出了深入地研究东方文明的课题。这是东方各国的共同需要和共同的责任。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必将有助于东方各国的协调发展。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

第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研究东方文明的需要。当代经济发展的特点是越过行政区划，越过国家界限，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路。欧洲国家率先走了这条路。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

也正在走这条路。独联体国家也意识到了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整个东方各国迟早必然走上这条路。研究东方文明有助于东方各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增强凝聚力，减少离心力，多一分理解，就多一分支持。实现优劣互济、长短互补、平等互利，探索出一条充满东方特点的和谐互助的经济发展道路。

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人类最早的经济活动是靠河流开展起来的，黄河、恒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创造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以后人们进步了，由河流走向海洋。地中海沿岸首先崛起，逐渐扩展到大西洋沿岸诸国。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太平洋沿岸诸国，除了少数国家紧紧跟上以外，多数国家显然落后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说明，各种事物一般说来是“物极必反”的，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向反面转化。这是经过无数次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先进的不大可能永远先进，落后的也不可能永远落后。太平洋地区会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这是完全可能的。因而研究东方文明，让东方智慧光发扬光大，有助于太平洋地区经济的繁荣昌盛早日到来。

第二，文明外交的日益频繁，提出了研究东方文明的需要。当前的世界时尚和过去有很大不同，穷兵黩武、大欺小、强凌弱的国际关系已被世界人民所反对，和平谈判，双边或多边对话，已被许多国家所采纳。那种靠炮弹说话的侵略行径在许多地区遭到了可耻失败，鼓舞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信心。因此，开展文明外交是当代国际交往的主流。研究东方文明，让西方各国更好地了解东方，能够促进文明外交的顺利发展；让东方各国更好地了解自己，发扬东方文明的优长之处，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也提出了研究东方文明的需要。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

产生的不同文化，不断丰富自己的特点，在交流中才能自立，在交流中才能共生，才能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因此，缺乏自我发展的内在活力，搞不好文化交流，就等于自己抛弃了发展的良好条件。所以，研究东方文明，弄清楚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在广泛的交流中，特别是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对比研究中，才能更好地丰富和发展东方文明。

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是现实意义很大的重要课题。

